



简报系列

序列号：BR20071211CH 总第4期

## 市场化，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

**【摘要】**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与西方有何不同？这一动力又将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无法完全解释。发掘中国的独特经验与教训，将为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会议主题：**对中国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讨论

**主办单位：**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时间、地点：**2007年12月11日；中国北京，清华大学

**主持人：**肖耿，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讨论嘉宾：**谢寿光，社科文献出版社

胡永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白南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王小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Jane Golley，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Huw McKay，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

盛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宋立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BRIEFINGS

SN : BR20071211CH VOLUME 4

## China: 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

**【Abstract】**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At the fourte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 in 1992, the economic reform was targeted at establishing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which market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So far,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for thirty years, how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market in driving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how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China's marketization, and how to deepen the marketization economic reform become vital issues.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organized experts to discuss those topics at the release conference of a new book "China's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TOPIC: China, 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

**ORGANIZER: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TIME & PLACE:** December 11, 2007;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MODERATOR:**

**Xiao Geng**, Director,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SPEAKERS:**

**Xie Shougua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Wing Thye Woo**,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tin Yifu Lin**,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ai Nansheng**, School of Agriculture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Wang Xiaolu**, 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Reform Foundation

**Cai Fa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ane Golle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uw McKay**, Westpac in Australia  
**Sheng Yu**,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ong Ligang**,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与西方经济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大多源自技术进步显著不同，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很大部分源自市场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企业微观效率的提高。

这一进程真正开始于 1992 年，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 一、市场化——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宋立刚教授认为，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真正的驱动力。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已基本建立了市场体系，并在国际上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市场化改革成绩斐然，三十年的改革中，GDP 快速增长，增长率一度达到 9.5% 和 9.6%，甚至接近 10%。从理论上讲，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包括资本要素、劳动要素以及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要素投入、劳动要素投入及全要素生产力这三个因素都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由全要素生产力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 30% 左右），而这三个要素增长背后的驱动力正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这三十年改革中，正是市场化的推进，导致了要素充分有效的利用，同时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所以从增长的公式后面隐含的东西就是市场化，市场化的作用导致了中国各种要素效率的提高，导致了微观基础的变化，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总体来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后，市场化进程加快发展。截至目前，中国的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市场化，90% 以上的产品实行市场交易。

尽管市场化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这一进程并没有完结。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相对缓慢，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包括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原材料、能源等市场。此外还有一个市场，按照经济学原理，就是外部效应，与讨论甚热的环境问题有关。尽管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益，但市场实际上也能发挥很大作用，比如减排市场交易。这些市场都还有待完善。

进一步市场化的进程——尤其是要素市场的进程——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中国未来改革进程、经济增长速度，它决定着中国未来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动力。

通过推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在资金价格的信号指导下，资金的使用效率将得到提高，储蓄会转向投资和消费。通过确立劳动力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将会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除了确立这些要素的市场作用以外，也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即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市场化也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只有政府治理手段和市场手段同时发挥作用才能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

市场化的推进，不仅涉及到市场本身，还涉及到确立市场体制相关的法律、政策相关的问题。推进市场化并非否认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而应当通过探讨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的结合，来探讨市场化进程。

## 二、渐进转型模式——中国对内与对外市场化的路径

市场机制对现代经济无疑是一个最有效的机制。确立市场化的目标之后，如何从起点走向目标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究竟何种模式转型更有效？如何进一步深化市场化，迎接国际化的挑战？林毅夫教授认为：渐进式改革模式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二战后，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节，推行市场化改革。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向市场化转型的问题。

经济转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休克疗法，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改革，最有代表性的是波兰、捷克、苏联等国家。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包括中南美洲的智利、非洲的毛里求斯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

事实证明，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上出现了大崩溃和长期停滞，尽管长期会渐渐复苏恢复活力，但毕竟浪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交通不便、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先天原因，其市场秩序不够完善，采取渐近的模式进行转型比较好。

中国当时采取了双轨制的方式转型，如果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比作过河，中国采用的方式即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前进过程中，发现机会在什么地方、阻碍在什么地方，最终一步步达到目标，而非简单的跳过河。

现在，中国相当于处在河中间，跟河岸比较接近，但这也意味着所有的制度扭曲并没有一次性被取消掉，应当想方设法逐一调整，继续市场化进程。

还未完成的市场化不仅包括对内部制度扭曲的纠正——在原来的制度体制下，形成一大批没有支撑能力的企业，为了保护补贴那些企业，形成了大量扭曲制度；也包括国际化、全球化本身，这是一个对外的更大的市场化。

工业革命后，技术变迁导致交通运输费、信息成本等交易费用不断趋同，市场范围也因此越来越广，从而一个边界内部的市场必然变成边界外部的市场，国际化趋势浩浩荡荡、不可抵挡。因此市场化也包括国际化转型，即对外的更大程度的市场化最终走向国际化、全球化。从中国经验来看，国际化已经带来了许多好处，成为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

但怎样国际化确是需要研究的，事实证明，一步就完全国际化的发展中国家，常常危机不断。

无论是内部市场化还是外部市场化，现有的经济学对转型的研究非常欠缺。这种情况之下，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也不能简单引用现有经济学中的现成看

法，因为很多现成看法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我们的限制条件与机遇表面虽然看起来与发达国家差不多，实际上却存在巨大差异，我们的转型路径有待于对中国经济有足够深入了解的学者共同来进行研究，有创造性地借鉴他国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最终寻找到真正适合我们特定条件的转型路径。

十七大提出对社会科学要成为国家的思想，提出社会科学应该进行学科创新、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创新，我觉得有这种创新的视野，我们社会科学界才能够真正为中国完全市场化进程做出贡献，我们国内社会科学界，才真正能够为世界的社会知识的积累做出贡献。

### 三、如何衡量市场化

如何根据中国的经济情况合理度量市场化进程？如何衡量国内各省市市场化进程的相对趋势？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有正相关关系？如果存在正相关关系，则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何计算？

王小鲁教授、樊纲教授及朱恒鹏教授认为，回答该问题首先需要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市场化进程，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对中国市场化进程进行了评价，并使用定量的市场化指数来计算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是一个用比较的方法来测度中国各省市场化相对进程的评价系统，使用了5个方面，23个基础指标来评价市场化的相对程度。市场化指数使用了客观数据，而非主观评价方法，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资料中的统计指标，也有一部分数据来自企业调查系统中的企业调查及其他相关数据。

市场化指数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评价市场化，其优点在于能够把无法直接比较的不同指标标准化，并综合为方面指数和总指数，从而在总体上反映市场化状况；而在考察具体指标时则不需要进行这种转换。

第一个方面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用政府预算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来反映政府和市场各自在资源配置中占有的份额。结果显示，市场化改革期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的比重也显著减少。虽然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九十年代末至今有所上升，但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并不完全表示市场化程度降低。

第二个方面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市场化指数系列的五个方面中，进步最快、变化最大的是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改革前，国有企业在工业部门中占绝对主体地位，但效率低下。非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仅为22.4%，到2005年上升到69.2%。根据工业数据，非国有企业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份额到2005已经上升到了65.6%，在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超过了70%。

第三个方面是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在改革期间，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比重逐步上升，在2004年，这个比重达到了92.8%（不包括公用部门的产品和服务部门的产品）。

此外，改革期间，绝大部分的非关税壁垒都被取消，总体关税水平也有了显著下降。在国内贸易方面，地方贸易保护也明显下降，现在来看，地方贸易保护已经不构成阻碍国内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四个方面是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总体而言，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落后于商品市场的发育，然而各种指标表明，近几年要素市场的发育还有较明显的进步。这些数据包括测试劳动力流动情况、金融市场发展情况以及技术市场发展情况的可得数据。

最后一方面是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考察中介组织发育时，需要考虑独立执业的会计师、律师、市场咨询机构、行业协会等为市场服务发展状况。但目前能够得到的只有律师和会计师的数据。从得到的数据来看，法律制度环境方向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从市场化的不同方面来看，产品市场的发育、政府干预的减少等方面进展较快，但部分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的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发展相对较慢。

王小鲁教授、樊纲教授及朱恒鹏教授进一步对各省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横向比较。通过年度系列的追踪式分析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市场化的相对程度并进行排序，比较 2005 年和 2001 年的变化，市场化进步幅度最大的是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接下来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排在最后的是西藏、青海、甘肃、贵州、陕西、宁夏等西部省份。

在分析各省的市场进程时，市场化指数没有使用代表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不代表经济发展的程度，但各省分市场化进步程度排序与经济发展程度排序却有非常强的相关性，这也说明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有很强的因果关系。

从 2005 年中国的市场化状况分布中可以直观看到东南沿海地区市场化程度最高，中部一些地区和少部分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处在中游位置，市场化程度最低的是西藏、青海、甘肃等省份。

但是，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具体分析的问题，如内生性问题，即究竟是市场化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带动了市场化？通过市场化指数来评估中国市场化进程之后，作者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采用计量经济学来测量市场化对经济增长是否有贡献。这个计量分析采用了 1997 到 2005 年的逐年分省指数来测度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论是市场化在整个测度的期间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贡献，尤其是 2001 年到 2005 年时间内，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两个百分点，即全要素生产率(GFP)的提高中的大部分源自市场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企业微观效率的提高。这与西方经济中全要素生产率大多源自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不同。

## 四、溢出效应——市场化及经济增长在地区间的相互作用

在过去二十年改革开放中，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的程度越来越高，但有数据表明，国内仍然存在地区间差异。有学者担忧内部市场不统一会导致经济增长不稳定，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有些因素，如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可以消除这样的忧虑。事实上随着物流以及人流在地区之间的转换，一个地区某种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冲击会引起另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或正向或反向的变化，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也在许多发达国家中得到了证实。

在市场化与经济增长方面，Jane Golley 教授与 Nicolaas Groenewold 教授通过矢量自回归框架（VAR）来分析 1953 至 2003 年间中国六大地区之间的数据来评价宏观经济冲击在某一地区产生的经济影响，同时考查这些冲击对其他相关地区的经济影响，即产出溢出程度。当作者研究扩展到跨时段的数据时，发现随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区域间正向或负向的溢出效应的连带效果和传递效果会更加明显。

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中国东部、南部地区，包括长江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高，地区溢出效果非常明显。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中、西部及落后地区有显著的带动效果，并未发现很强的相反结果。但与此同时，中国的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东部或更落后的一些地区经济连带效果并不强。

依然未能找到答案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尽管发现了溢出的效果，但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实现的？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地区差异，如何是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

## 五、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劳动市场一体化

对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市场发育完善是其转型成功与否的标志，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劳动力市场发育是向市场制度迈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劳动力市场也与国内的通胀率及人民币汇率有密切关系。中国过去的快速增长、经济繁荣与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效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密不可分。但这种人口流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又能否成为经济持久增长的动力呢？

### 1.“刘易斯拐点”的实证研究及政府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

孟昕教授和白南生教授根据广东省七个企业 2000 年至 2004 年广东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七家大型工厂的工资数据，来检验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

他们采用了最有效的检验方法之一——分析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趋势。如果剩余劳动接近耗竭，那么非技术工人工资将出现显著的增长。通过研究五年里七个企业中流动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发现样本厂家工资在 2000 到 2004 年期间增长速度非常缓慢，尤其是排除



了人力资本、学历、性别因素后，看不出明显的增长。因此，无法得出中国接近“刘易斯拐点”的证据，即中国并没有耗竭剩余劳动力并达到劳动力短缺点。

虽然文章开创性地使用了非技术工人工资数据研究“刘易斯转折点”，但作者也客观分析了文章的局限。一方面，这套数据截至2004年底，但2005年之后包括广东省在内的珠三角一带，政府两次调整了最低法定工资，涨幅约有一半。政府的政策变化虽然不能准确、及时体现市场供求关系，但也折射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因为最低工资线等政策变化的影响，这些新的数据很难与此前的研究结果作简单对比。另一方面，工资数据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因为我们的最低工资不是小时工资，而是月工资，由于工作时间数据可能被低估，从而小时工资率可能被高估，最终可能会导致估计值偏高的系统性偏差。

两位学者从2007年1月开始对劳动力区域流动进行比较，发现不同地域、不同性别之间，外出务工与本地非农业就业人口之和占当地人口比例的差别很大。比例高的超过一半，比例低的只有百分之十几，而且在外出务工人员较少的地方，考虑农业生产规模后，农业劳动力相对农业用地仍然过剩。

这样巨大的差别反映农业人口流动存在障碍。

这个障碍除了众所周知的户籍制度，还可能与信息共享的社会网络有关：务工人员通过信息共享网络一方面可以获得工作、生活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外在的社会支持。早期外出务工人员通常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得到信息，及时解决了外出过程中出现生活、工作上的问题。而在外出务工人员比例较低的地区，这种网络的建立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过程。当对务工人员的需求增加或者工资增加，由于社会网络不能很快建立，这些信号无法顺畅传递给希望外出务工的农民。

政府适时的干预对这一网络的建立可能起很大的作用。举个例子，东北某县县长（原市劳动局长）努力发展打工经济，以帮助农民外出务工来帮助农民增收，结果当地短时间内顺利外出务工的农民很多，同时也带动了非政府组织的外出务工。

## 2. 劳动市场一体化的实证研究

市场一体化是市场化的体现，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市场一体化的含义广泛，包括区域间的一体化，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一体化等。研究市场一体化，往往需要通过较长一段时间搜集数据，通过观察价格变动关系来确定一体化的程度。关于市场一体化，较早的研究是关于农产品市场的一体化。当时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的产品一体化领先于要素一体化，对产品一体化的研究也领先于要素一体化的研究。究其原因，一面要素市场一体化本身的难度较大、相对滞后，另一方面要素市场一体化的研究所需相关数据较产品市场的数据更难获得。

关于市场一体化也有不少争议，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区域间的市场包括要素市场的分割却越来越严重。都阳教授与蔡昉教授深入研究了要素市场化问题中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他们通过劳动力市场数据来观察市场化程度，从不同区域制造业工资的变化情况得出，工资差异在区域间不断缩小，也即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增加。

观察的样本是农民工的工资数据。在中国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分割，农民工和本地工人在两个独立的劳动市场上得到雇佣。相对本地工人，农民工得到政府的监管和保护更少。因此，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主要由市场决定，因此能较为真实反应市场情况。。

另外，近十几年中，中国农民工有两个特点，一是流动性强，农民工已经成为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农民工将近占 2006 年在全社会劳动力市场就业人数的一半。他们在区域间的流动和规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间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交流，也即促进了一体化的进程。

调整了人力资本、性别差异等其它决定工资差异的因素后，再用区域因素对工资数据作分析，得出的结果是，由于中国农民工越来越多的大规模区域流动导致劳动力市场区域间信息充分交流，最终推动了区域经济市场一体化进程。

此外，劳动力市场差异的隐含条件是存在劳动力市场，因为如果没有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区域劳动力市场，就无法将市场信息传递到劳动力还未充分转移的地区。如果本文的研究能够证实中国区域间市场是存在的，并且越来越一体化，就表明我们可能具备了利用不同区域间劳动力，实现城乡融合的条件。

## 六、人民币为什么没有快速升值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作为经济增长的“晴雨表”，一直备受关注。

按照不断被验证的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人民币应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而大幅快速升值，但中国的现实却并未如此。

为什么中国不能完全放开货币？为什么人民币没有快速升值？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悖论——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与庞大的剩余资本并存？

### 1. 中国为什么选择渐次开放外汇市场

中国的外汇市场一直处于争论的中心。在《改革中国汇率安排：货币和金融自主权，改革次序与外汇市场》一文中，Huw Mckay 教授不仅分析了外汇市场对整个宏观市场机制的影响，也详细论述了政府在外汇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中国外汇市场具有低水平的成交额和不成熟的特点，而外汇流动性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低下，直接导致了中国现有的外汇政策。

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现阶段的外汇体制是不对称的体制，即政策鼓励资本流入却不鼓励资本流出，从而造成了资本出入不对称的现象。

这是由于外汇市场基础设施不够成熟、脆弱的银行体系仍无法有效应对完全开放的外汇市场，而现阶段中国央行的政策主要目的在于规避金融风险，所以不应当由市场来决定外汇。

中国愿意并且能够使汇率制度变得不断灵活，并且已经可以观察到中国政府正通过采取一定措施减少资本帐户的不对称性，促进外汇市场基础设施，以求最终建立更具灵活性的汇率制度来代替比较固定的汇率制度（比如允许 QFII 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允许 QDII 投资海外市场、外资金融机构或中国本土建立的在岸远期市场），同时中国的银行也越来越重视金融市场规律，抗风险能力也不断增强。

但是，现阶段央行为了规避金融风险，仍没有条件也不应当通过外汇市场来决定中国的汇率水平。中国现在的改革，是在为整个外汇机制的灵活性做准备。

而这样的战略究竟能持续多久，取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是否拥有更独立的外汇储备倾向的自主权。

不过，Huw Mckay 教授希望在未来一年当中，名义汇率能够升值，因为更具灵活性的汇率对于中国过渡期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有助于市场行为的对称性，也能够促进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

## 2. 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遭遇中国挑战

即使是在 2005 年 7 月中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之后，人民币却并未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大幅升值，这招来了强大的国际压力。

普遍的逻辑是，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利率，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内在动力。这与国际通行的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有关。

这个定理讲述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生产力的差异随着贸易品部门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扩大的话，那么会导致这个国家的价格水平提高与实际汇率升值。具体来说，这个传递效果是通过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会提高工人工资，工资的提高会使劳动力从非贸易品部门流入到贸易品部门，从而抬高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成本，继而提高非贸易品部门的商品价格，从而使整个国家的价格水平有所上升。

这个定理在世界经济史上一再得到验证，但中国却仿佛是个例外。在过去的十年中，可以明显的观察到，中国制造业部门，特别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但人民币汇率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Jane Golley 教授与 Nicolaas Groenewold 教授认为中国之所以例外，是因为中国的现实并不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的一些强假设：

第一，在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中，货币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贸易品生产力提高使得非贸易品价格上升，但中国的非贸易部门生产力提高也很快，与贸易部门的生产力提高差距不大，从而降低了升值压力。

第二，定理假设很快将达到充分就业，但中国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一条件不成立，导致贸易出口部门生产力提高并未显著影响工人的工资及非贸易品价格的提升。

第三，技术进步，尤其是中国的非贸易品部门也获得了大量技术。

第四，中国储蓄率远高于投资率，削弱了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或压力。

因此可以看到影响人民币升值的中国因素有：非贸易品部门的技术进步以及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过度的劳动力密集；金融市场可能的开放性——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可以进行对外投资，产生大量资本留出，而资本的净流入与留出将成为影响实际汇率的重要因素。

在 Jane Golley 教授与 Nicolaas Groenewold 教授看来，基于以上理由，不能得出人民币未来有很大升值的判断。

### 3. 人民币汇率难题与中国金融业痼疾

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所遭遇的挑战，跟中国的现实情况密切相关，人民币汇率的难题，实则是中国金融业的痼疾，肖耿教授深刻探讨了这一根源。

在他看来，升值与通胀是中国必然发生的两件事情。由于相对美国价格水平，中国的价格水平太低。随着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价格水平必然不断上升，而升值与通胀则是两个可能的途径。

采取人民币升值还是价格调整？这是两个选择，两者都应该有，而且可以相互替代。如果工资涨得太快，价格通胀一定会发生，如果不涨工资和价格，人民币就会有升值的压力。

但是这两者都将带来许多压力。

升值太慢会带来贸易摩擦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压力：美国人觉得中国由于血汗工厂、政府补贴等种种原因使得产品便宜，导致中国工人抢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因此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压让人民币升值。

而如果选择通胀，一旦进入预期通道就很难控制，而且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

中国在高速增长多年之后，依然是低通胀与升值缓慢，不仅积压了内在的价格上升的压力，而且招致极大的国际压力。

但实际上，中国图景的真正奇怪之处，在于一边是庞大的剩余资本，一边是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由于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西方理论中完全就业的假设在中国不成立。

尽管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很难估计，但目前尚未有明确迹象表明劳动力已经进入全员就业的状态）。

这幅奇怪图景的节点，正是中国积弱的金融市场。在中国，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但中国缺乏效率的金融市场却无法将这些储蓄转换成投资，也无法区分好的投资和坏的投资，反而使得过多的无效率投资造成了经济过热的假象。

从宏观经济来看，中国的大量资本剩余实际反映了过冷的经济，需要大量投资于地铁、能源、环境保护方面。但由于金融体系、计划体系、监管体系等政府相关部门，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市场需要，无法将剩余资本最有效率地利用。

因此，人们应该关注并帮助中国解决其面临的实质问题，即如何使中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本相结合，帮助中国发展，这样中国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也创造更大的市场。

## 七、中国需求影响全球能源

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工业化进程不断加深，中国近年能源的需求迅速增加。毫无疑问，中国能源消费迅速增长，将不仅改变未来全球能源供求关系，而且可能对全球环境保护具有潜在的影响。围绕这一趋势，盛誉教授与宋立刚教授从全球视角分析了中国能源需求的现状和未来。

从中国与世界联系的角度来看，中国与世界联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不仅参与了世界分工，同时也越来越多地使用世界的能源和矿产，使用的资源占世界资源的份额的比重日益增加。中国对世界能源的需求甚至改变了世界能源贸易的结构，并影响了世界能源价格。随着中国 GDP 年均以 10% 速度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耗在 2005 年已经达到了 16 亿吨，提高了 36.5%，这一比例在 2000 年到 2005 年之间，已经占到世界消费的 12.6%，中国的显著变化引起了从能源消费的角度、环保的角度，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未来中国的能源需求，特别是从国际市场上获取能源发展方向到底如何？是不是随着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中国的能源需求会继续加大？文章根据对经济增长阶段的讨论，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

根据一国增长对于要素特别是能源要素的需求与人均收入、所处工业阶段等相关关系，文章预测出一国经济增长处在人均 GDP 在 5000 美元到 1000 万美元之间时，会出现对要素产品特别是能源产品和矿产产品一个更高的额外的需求。目前中国人均 GDP 为 2686 美元，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中，人均 GDP 将提高到 4996 美元，而这个正好是我们所预测到的中国将经历一个对国际资源产品较大需求的阶段。为了削弱或减少中国的需求起的供求关系的差异，以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两点：一是转向使用更加清洁能源，目前为止，70% 能源消费是煤，有很大的污染性；二是

关闭或者降低无效的小企业，以实现有效的资源利用，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发展与可持续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太平洋发展研究院是最早认识到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可能性的机构之一，从 1990 年代开始，研究院每年选择一个主题举办一次会议，邀请专家学者对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然后集结成书，这个系列迄今已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

本次会议召开于该系列今年的中文版新书《中国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发布之际。

( 本文由马静编辑整理，肖华、李金迎审校 )